

流民史

陆德阳著



不以影响对历史的推动
颠沛流离话功过
历代流民实录 谦生百态

D691.9/7

陆德阳著

流民史

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21541087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流 民 史
陆德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吴县艺文书店 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插页 10 字数 179,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645-X/K·97 定价：14.70 元

图一 选自《点行斋画报》——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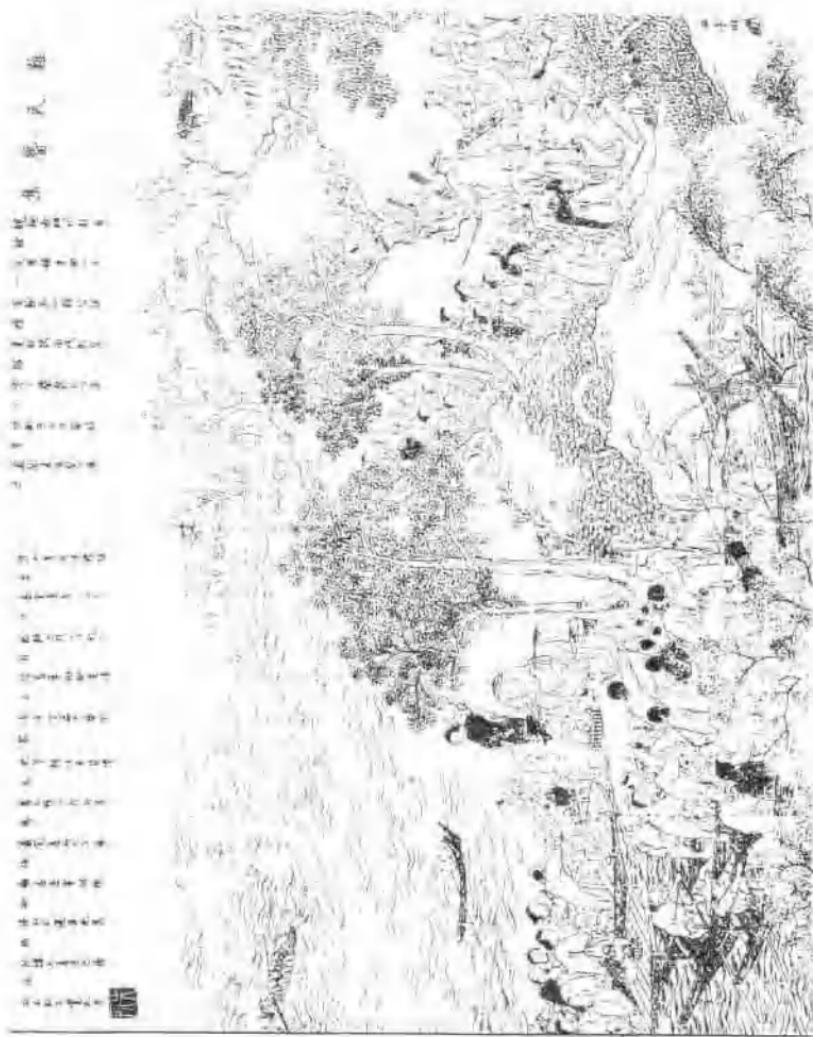
图二 选自《古石斋画报》

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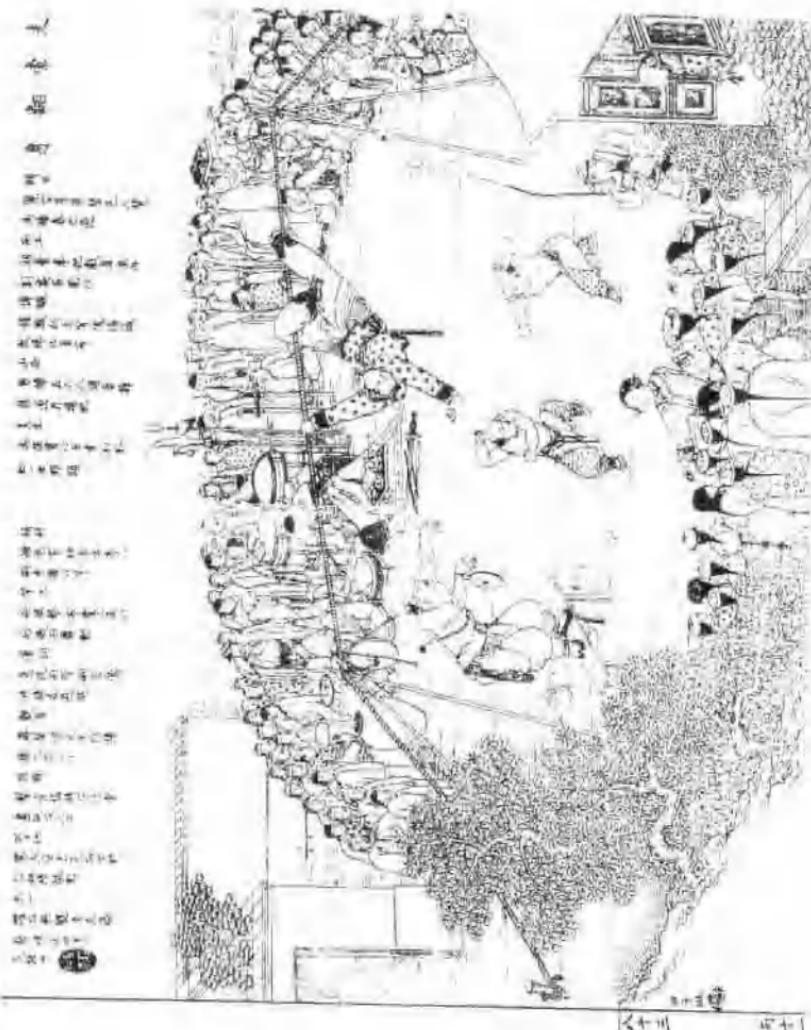
二十一

中四





圖四 《白話小行者圖報》





陳 爾

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作曲家。我的音乐创作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能向别人解释，我不能向别人证明。我只能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享受。我的音乐创作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能向别人解释，我不能向别人证明。我只能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享受。

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作曲家。我的音乐创作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能向别人解释，我不能向别人证明。我只能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享受。



前　　言

虽然要给流民下个确切的定义——揭示其内涵、限定其外延——是相当费力的事，但在《流民史》开篇时，又不得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们的解释总会给人留下商榷修正之处，并不完全符合确切而简要的要求。

“流民”之流，指流动、移动，与静止、土著相对；“流民”之民，指人民、社会下层的人和统治者相对。

流与民构成双音节词的固定结构，至迟到战国年间已被《管子》一书记录、使用：“禁迁徙，止流民，围分异。”其意义和今天的完全相同。

中国历史上，流民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屡见之于文献记录之中。《史记·万石传》：“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汉书·食货志》：“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富积。”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沈稼湮梁颍，流民溯荆徐。”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齐王张令公外传》：“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至今日，流民一词仍在人们口头交流、书面记录中普遍地使用。碧野《没有花的春天·序曲》：“于是从中原迁来了不少的流民，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扎了根。”

不厌其烦地引用以上的例证，不仅可以说明流民一词在中国古代使用的广泛，而且也可以让读者初步明白流民所指

称的对象。

其实，古人身处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剧烈变动之中，也曾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从不同的侧面，对流民一词作过诠释。

唐人李贤解释流民为“流离以就食者”^①；颜师古称流民是“散失其事业”^②者；《明史·食货志一》说：“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清人王夫之则言：“不务农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③；清人杨景仁解释说：“流民者，饥民也”^④；《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二日载，“山左沿河一带，土脉瘠劣，时被水荒，每届冬令，该乡民等动辄结队四出求乞，人多称之为流民。”

从以上所引用的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流民一词的解释其实并不相同：既有狭义、广义之分，又有此一义、彼一义之别。

狭义者，如李贤、《明史》、《时报》所作的解释。着眼于流民产生的原因——年饥或避兵及流民的特征——离乡外出两个方面。

广义者，如杨景仁的解释。其实饥民的含义要比流民广泛得多，饥民他徙者才能称之为流民。若虽受冻挨饿仍留在原籍没有他徙，称之为流民，似乎未必要当。

至于颜师古、王夫之的解释，指的是无业之游民，已和狭义、广义的流民含义相去甚远，不属本文论述的范围。

现在谈到现、当代人对流民词语的解释，可以权威性的工

① 《后汉书》卷一五《袁淑传》注。

②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注。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惠帝二·流民》。

④ 《清经世文编》卷四一《荒政》。

具书为代表。

《中文大辞典》谓：“因穷困转徙于外之人民”为流民；《辞海》也说，流民是“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流亡在外，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其解释与“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的说法所差无几，当属流民的狭义用法。《汉语大辞典》则认为，流民是“流亡外地的人”。

按《辞海》的解释，流亡的意思是，因在本乡、本国不能存身而逃亡流落在外。其中应当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诸多原因。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经常有罪犯作案犯科后潜逃外地。但他们并不能被称为流民，而是潜逃犯。

由于古人对流民的解释颇有分歧，今天辞典的说法也不一致，因此在展开论述流民史之前，有必要对本书所要叙述的流民一词，作出适当的解释和限定。

我们认为，流民是指因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的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而离乡背井、流向他乡的人。

所谓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的种种原因，是指产生流民的动因。人们因遭遇自然灾害而流亡他乡，是不难理解的。但和许多辞典的解释不同，我们在紧接着的叙述中以社会厄难一词概括产生流民的种种社会原因，大致包括战争、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等诸多方面。

至于其他的种种原因，指的是贫困之人本能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欲往外乡作一番奋斗，以及那些因闹家庭矛盾而弃家出走等等。尽管由这些动因产生的流民人数远远不能与以上的两种情况相提并论，但他们既属于流民之列，在《流民史》中理所当然应占有一席之地，不应当被疏漏了。

定义中的离乡背井、流向他乡，是指流民流亡过程的特征

和手段。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五谷文化”，重视“世代定居”^①，崇尚祖先，留恋土地，热爱家庭。“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农民及居住者，“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来耜，皆为子孙百年大计”^②。曾有一位名叫刻塞令的外国哲学家，考察了中国内地乡村，写了一本《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著作，对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特性作了一番分析、论述：

这种地方的人民，无论或生或死，都是轻易不肯离开祖遗的田地一步的。照他们底行动看来，正仿佛是人属于土，并非是土属于人了；而且他们底那种死守家园的固执情形，也好像是因为他们底土地，始终不肯放他们离开的缘故。他们无论人口怎样增多着，总是居留原处；至于他们唯一的自存方法，就是利用他们继续加勤的工作，来苛索自然所赐的吝啬的礼物；等到死后，他们就同入他们底母胎——土地，而更含永久性地继续住在那里。……他们以为土地在显露着他们祖先底精神，更以为他们勤工底报答和怠惰底谴责，都在他们祖先底掌握之下。所以这些祖遗底土地，同时也就是他们底历史，更就是他们底备忘录。^③

费孝通先生据此得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世代定居是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

② 同治《苏州府志》第三卷。

③ 转引自马罗立《饥荒的中国》（中译本），民智书局1929年版，“芬力君序”。

常态”^① 的结论。

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状况的。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都相互对立、相互矛盾，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有世代定居就有不断迁徙；有常态就有变态；强调安土重迁，就会有离乡外出。

当然，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决不是心甘宁愿的，而有更多的万不得已、无可奈何。以后一旦灾情缓和、情况好转，流民中的一部分就会自觉地返回家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流民离乡背井、流向外地的目的何在？为了避难、求生。避难的意思较为简单，即躲避灾难。求生的意思却有两层。一层为求得生存，另一层为追求新生。求得生存，较多地表现出被动性；追求新生，却体现出了流亡者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他们如何追求新生，将在以后流亡的过程中寻找、发现，在流亡之前，尚不明确。

流民的这种独有目的，与许多在社会上流动的人区别开来。譬如经商行贩，侠客游民，游方和尚，他们也不停地在社会上流动，但由于他们不具有“避难、求生”的目的，因此他们都不能被称之为是流民。尽管“避难、求生”有时仅是流民的美好主观愿望，在事实上并没有能够实现。有些流民甚至老死沟壑或客死异乡，但是他们终究是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抱着“避难、求生”的目的而离乡出走的。

在中国历史上，流民现象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阶级社会形成的夏商周时代，至今已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选集》。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可谓源远流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在这种形势下，还存在着以“避难、求生”为目的而离乡背井的流民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流民现象没有消除。譬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人口的逃荒，文化大革命中进城乞讨的农民，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盲流潮”等等，都是其中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对社会影响持续不退的较大的流民现象。

近年来出现的“盲流潮”也是一种流民现象。尽管大部分盲流的产生有了全新的动因，不再是农民摆脱自然灾害、社会危难、求得生存的一种方式方法，而是在“中国大陆十年改革开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加上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①的新形势下，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不甘心像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贫瘠的黄土地上默默无闻地生活，主动走出贫穷的家乡，走进城市或其他富庶的农村，熟悉新环境，寻觅新职业，创造新人生。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工作，在流入城市东奔西走，生活贫困，不为人们接受、理解，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仍然属于流民之列。

应当指出的是，盲流和民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通常所言的盲流，是指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没有取得户口凭证、没有收入、没有住所的人员，即“三无人”

① 江风《流动人口新透视》，香港《文汇报》1989年10月12日。

员”。因此，那些已被流入地企事业单位录用或已被允许留在当地从事各项职业的农村劳动力，显然是不能被称之为是盲流的。

但是，盲流又和民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双方会发生互相转换。有一些盲流，初来乍到城市，暂时没有正当的职业，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经济收入。以后才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安下了身，成了一位民工。也有一些民工，因种种原因下了岗，沦为盲流的一员，不知何时才能重新找到职业。

由于盲流和民工之间存在着这些复杂的关系，有些人就将盲流和民工当作同义词使用了。如葛象贤、屈维英著《中国民工潮》，其书副标题为“盲流真相录”；莫荣著《民工潮的背后》一书内容简介称：“1989年以来，每年春节过后，总会形成一次‘民工潮’，上百万民工奔向城市，寻找就业门路，寻找新生活。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盲流’。”

虽说将民工与盲流混用是事出有因，但是严格说来，我们觉得是不妥的，值得商榷。

在现阶段，除了盲目进城找工作、暂时又没有落实的盲流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本来就是名副其实的流民。他们流入城市不是为了找工作、寻求新生活，而是流浪、乞讨。1996年4月3日《解放日报》转载《重庆晚报》文：“十二岁盲流儿童王文利趁列车员不备，突然翻窗而去。”1996年3月27日《解放日报》载：“三个男孩分别是甘肃省武都县流浪来沪的寇某、蒋某和魏某。”此外，从受灾农村流落到城市的乞讨者、拾荒者，也都是本来的狭义流民。

流民现象不仅跨越社会形态，从古代衍生到了今天，而且